

“纪念李大钊就义 90 周年 暨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赵国英

(唐山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2017年4月,值李大钊就义90周年之际,在钊同志的家乡召开了“纪念李大钊就义90周年暨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9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突破。

关键词:李大钊就义;90周年;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4-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4.001

The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Li Dazhao's Thought an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Li Dazhao's Death

ZHAO Guo-y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Academic Journal,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In April 2017, when it was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Li Dazhao's death, the Symposium on Li Dazhao's Thought and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Li Dazhao's Death was held in his hometown, which has been the largest symposium on Li Dazhao's thought in the past 90 years. Some breakthroughs were made in research areas,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esearch.

Key Words: Li Dazhao's death; 90th anniversary; thought research; symposium; minutes

“纪念李大钊就义 90 周年暨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河北省社科院、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唐山学院承办。会议主题是:继承大钊遗志,弘扬大钊精神。本次研讨会是以唐山学院学报“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为平台,举办的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李大钊的理想信念与献身精神,发掘和培养学术新人,进一步推进李大钊研究。

2017年4月28日,“纪念李大钊就义90周

年暨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唐山南湖紫天鹅大酒店综合馆开幕,北京大学前任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朱善璐,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的孙子李青,原水利部水文局主任工程师、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统战部部长陈学民,原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郝斌,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资深教授梁柱,河北省委党史办副主任、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宋学民,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月,唐山市委

作者简介:赵国英(1961—),女,河北丰润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李大钊研究史研究。

宣传部正县级调研员刘育新,唐山学院党委书记刘学东,唐山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志安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唐山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志安教授主持。

研讨会分三个阶段: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分组讨论。

开幕式上,唐山学院党委书记刘学东教授代表承办单位唐山学院致辞。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从高等学校肩负学术研究和文化创新的历史使命的高度,阐发了《唐山学院学报》开办“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专栏的意义。刘学东指出,李大钊研究栏目开办以来,积极参加李大钊思想研究和党史研究,得到了李大钊思想研究和党史研究学者的大力支持,学报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研讨会必将收获丰硕成果,唐山学院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继承和弘扬大钊精神,努力在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扎实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唐山市委常委、组织部、统战部部长陈学民代表唐山市委、市政府致辞,介绍了大钊同志的家乡唐山近年的发展情况,提出纪念李大钊就是要继承大钊同志精神遗产,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北京大学前任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朱善璐教授,代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讲话,表达北京大学师生对大钊先生永久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他着重谈了如何把李大钊的思想、事业以及深层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特别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能够取得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服务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

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月代表河北省社科院和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致辞。她指出,本次会议是在党中央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深入推进经济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召开的,

也是2009年以来召开的李大钊研究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意义重大而深远。她还指出,李大钊的一生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李大钊的光辉业绩、崇高理想将永远凝聚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需要我们要从历史观的高度出发,传承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大钊的孙子李青,代表李大钊的后代发言。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爷爷李大钊的光辉一生: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义薄云天的献身精神和大爱无疆的公仆情怀。从非常感人的生活细节生动地再现了李大钊的人格魅力和仁者之心。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进行了主题发言。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梁柱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探索与思考——以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为基点》的主题报告。他重申李大钊在我们党历史上的定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主要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二是李大钊倡导的良好学风,以及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明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伟大转变的新取向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两个方面的前提就是,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时代意义的正确判断。针对学术界有人提出李大钊对十月革命有疑问、有犹豫的质疑,梁柱提出: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性质、世界性的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认识是非常明确的。从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了更鲜明的对比,一直到1919年,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十月革命是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历史对于李大钊来说,需要加以研究、观察、判断,因而也需要一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

梁柱认为,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判断和发表的文章中读不出他有犹豫、质疑。首先,

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和大无畏的精神,于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追求的民主主义已不再是法国革命时代的旧民主主义,而是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李大钊这种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已有了新的取向,这是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基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要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面目,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所揭示两个对待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是在透彻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是相似相通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理性和策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基于对中国革命新取向的探索。梁柱把李大钊的探索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主义观,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明确的制定了我们接受的、我们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李大钊指出将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将有共性和特性的表现。有共性和特性,这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理论是很有启发的。

梁柱最后指出,李大钊的研究及其成果应该说初步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为中国革命向新的方向的转变做了重大准备。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李大钊对尊孔复古主义的批判》。许全兴认

为,李大钊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是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中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批判尊孔复古主义,冲决历史桎梏,涤荡历史积秽,解放思想,阐扬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再造复兴而呐喊,无疑是李大钊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在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90年之际,重温李大钊批判尊孔复古主义的犀利、深刻、激扬的文字,学习和弘扬他的批判精神,对我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此,许全兴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批判尊孔复辟逆流、宣传民主主义;批判复古思潮、宣传唯物史观;尊孔复古思潮的现实意义。第一方面,许全兴指出,李大钊在肯定中国历史悠久有其光荣一面的同时,反复说明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势力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作用,一再发出冲击历史网罗的呐喊。这里,李大钊从民主主义出发,阐明“尊孔,专制复活之先声”,批孔实质是批尊孔,批封建专制主义,批复辟倒退的复古主义,是为了把人们从迷信孔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李大钊批孔并不否认孔子在历史上是伟人,有其历史价值,而旨在说明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在批尊孔复古主义时不仅充分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儒家的创新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方面,许全兴认为,李大钊在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就用崭新的思想武器——唯物史观解释近代史思想的变动,进一步批判尊孔复古主义。许全兴提出,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解释近代史思想的变动,批判了循环退落的历史观。针对唯心史观的文化决定论,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长文中,说明代表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孔子主义的崩坏和适应新时代的新思潮、新伦理的兴起的必然性。李大钊把打破旧的孔门伦理,产生现

代新伦理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李大钊的论述说明,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才能担负起完成建设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最后,许全兴指出,在李大钊生活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主要是被看作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障碍,不批孔,就不能前进,人们所关注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变革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继承性。今天,中国社会与先烈生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在今天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儒学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要从中发掘、提炼出积极的、有价值的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许全兴特别强调,我们虽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依然还存在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如何对待孔子、儒学决不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要密切关注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方向,应始终警惕复古主义思潮,警惕有人以现代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图谋。

在纪念李大钊时,不应忘记学习和弘扬李大钊的批判精神!

北京行政学院侯且岸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侯且岸首先就自己30年来的李大钊研究的心路历程作了总结。他认为,思想传统的问题直接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历史认识论,怎么看待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要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才可以证明这一点。要坚持逻辑和历史的一致,一定要还原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再谈我们的思想传统。之所以报告题目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就是要凸显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今天,李大钊一方面是被我们称颂的革命的导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同时也不断地遭人误读,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有过的严重的误

读。侯且岸教授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今天的人们不理解的误读。他认为,因为五四那个时代远去了,现在的我们无法理解五四时期的那一代学者,他们那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我们达不到。所以,就有必要提倡“我们要读懂李大钊”。他进一步谈到这个观点的依据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李大钊。

侯且岸在报告中回顾了回应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的问题和讨论的情况,认为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在他看来,石川祯浩先生的研究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当然也是一种提示,即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更加的精细化,绝不可大而化之。他认为,李大钊本人通晓日文,但他绝非译匠,而是一位深邃的思想者。今天我们在看石川祯浩的评价的时候,更应给予关注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整体的理解。如果当时有更为准确的译文可以参考,李大钊也不会、也不应拒绝的。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译文出自他的同窗好友,因此对李大钊参考别的译文也并不值得过于敏感。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倒是有一个事实,石川祯浩可能没有观察到,那就是负责编辑《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李大钊,专门把陈溥贤在《晨报》上发表的两篇译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奋斗生涯》,均编入“马克思研究专号”与自己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放在一起,这恰好说明李大钊并不想掠人之美。

由此,侯且岸提出,我们要用事实说话,但是我们用事实说话的目的不是追求单纯的考证,而是要把更深刻的思想命题从我们的历史的精细分析当中揭示出来。他深情地回忆了导师张静如先生跟他说过的一句话:说到别人不懂,你懂吗?你要让别人懂,你就得拿出你的成果来,而且你的成果是要有理据的。十年来,这句话一直激励着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的态度进行李大钊研究。

关于报告的题目,侯且岸谈了他的思考:他认为,通常我们对理想和思想传统的理解是抽象的、原则性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主观臆断色彩,表述方法往往是概括和提取出若干论断、结

论,然后据此来填充所需要的事实。显然,这样的分析、理解方式已经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人为地造成了逻辑和历史的割裂,致使丰富的思想传统失去了具体的、历史的内涵,流于空泛。

侯且岸主张李大钊研究需要从方法论着手,发掘真实的“思想存在”,动态还原历史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从中展现思想的矛盾与冲突,梳理思想传统,生成对传统的理性认知。他的报告《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就是循着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的一个尝试。

侯且岸从三个方面对“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他认为,在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考察李大钊思想的内涵,需要建构理性的思维,使用“理在事中”“实事求是”的方法,才能获取真谛。要抓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一关键性的认识论命题进行具体分析,还原当时的历史,从动态中揭示李大钊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价值。正是李大钊开启了对于历史认识论的探究,其代表作便是《史观》《史学要论》等。李大钊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史观、史观与历史、史观与人生观、今古论与历史之价值。李大钊提出,要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这里,“活历史”的内涵就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进程中的人性、历史学家的自律性。李大钊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记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己的,是含有进步的”。事实上,今天非常值得反思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与思路——“认识论上一般的考察”,我们并没有能够真正在思想当中加以确立。

其次,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多元化认知。侯且岸提出: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的学理探究的过程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是

多元的、理性的。李大钊尊重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存在,但又充分考虑文化环境、社会基础的差异;李大钊认定社会主义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社会制度,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尊重差异、包容差异。由此,侯且岸认为,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全过程,根据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还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都应是始于先驱者李大钊的。

再次,李大钊对民主问题的理性思考。侯且岸认为,李大钊早在五四时期就明确提出,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源的观点。李大钊着力对民主问题,尤其是无产阶级民主、民主与专政之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梳理。李大钊主要是从制度、社会生活的层面理解民主的。

侯且岸最后谈到从学术史的发展角度审视,李大钊的思想还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应有更系统、更精彩的发挥,使之趋于完善。但由于当时革命活动的影响,李大钊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延续深入的理论研究,确实令人遗憾。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作了《现当代史学史视野下的李大钊史学论著》的主题报告。邹兆辰认为,研究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对于李大钊有关史学方面的论著,包括著作、文章、讲义等,应该放在现当代史学史的视角下来考察,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思想内容、社会影响等,了解其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并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它在当代史学中的价值。同时,对于过去及现今研究中的种种质疑及相关论点,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作出必要的回答。

邹兆辰梳理了李大钊史学论著价值判断经历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多元思潮下的价值判断。20世纪30年代接受和运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的著作,主要有刘剑横的《历史学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版),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版),李则刚的《史学通论》(1935年版)等。第二次高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形势下的学术认同。这一时

期,李大钊史学著作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著作将李大钊对史学的贡献列入重要地位;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史学概论编撰的热潮中,李大钊的学术观点被大量引用;三是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邹兆辰就今后深化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加强李大钊史学著述、史学思想的探源研究;其次,要深入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各个方面,回答来自各方面的质疑。

南京审计大学吴汉全教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深化李大钊研究方面的主题发言,就李大钊研究的理念创新与新领域开拓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首先,关于李大钊研究理念的创新。吴汉全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李大钊研究要汲取时代演进中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思考、新判断,这是因为任何研究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因而也就必须与时代所提供的基础、条件相结合,汲取时代的新经验、新理念。二是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加以汲取。尽管李大钊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历史学的视域中进行,但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在研究中所形成的新的研究理念;而我们这个时代中所形成的如“问题意识”“话语体系”“文化自信”“中国道路”“逻辑谱系”“学术中国化”等,皆可在李大钊研究中加以借鉴。三是依据研究者学术研究的经验,进行有选择的创新,亦即根据学者自身学术研究的经验,在李大钊研究中提出比较新的研究理念。

其次,关于李大钊研究新领域的开拓问题,吴汉全提出要在既有的李大钊研究领域中进行进一步精耕细作。主要包括:一是对既有研究资料的充实与补充;二是对既有研究结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三是对既有研究理念的创新与反思,如革命史研究理念、中国化研究理念、问题式研究理念;四是在既有研究中进行诠释范式

的更新,如学术史诠释范式、社会史诠释范式、思想史诠释范式、文化比较诠释范式。

最后,关于新领域的开辟问题。吴汉全认为,可以在李大钊与中外文化交流、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李大钊外交思想、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等方面,开辟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吴汉全特别就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向。关于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个领域,他认为今后应重点研究这样几个问题:(1)李大钊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2)李大钊为现代文化建设所做的基本工作,在当时的文化斗争中提出了怎样的具体主张,又是怎样批判地继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主张的;(3)李大钊文化建设思想的特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关系;(4)李大钊的文化建设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5)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对于其文化建设活动的具体作用;(6)李大钊的文化建设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影响,今后又应如何继承与发展。关于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的研究,他认为要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1)“李大钊与北伐战争”与“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的关系;(2)李大钊“国民革命思想”在“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中的地位;(3)李大钊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之间的关系;(4)李大钊在北伐战争中统战思想与统战艺术问题;(5)李大钊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6)“李大钊与北伐战争”这个问题在李大钊的北方革命活动中的地位。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文通研究员首先就李大钊研究的路径和方法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在传统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范式影响下,李大钊研究存在的一些难以克服的瓶颈式问题,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比如,以阶级感情代替科学分析,明显地干扰学术上的理性分析;忽视基本史料的研究,存在着重理论、轻史料问题;未能处理好宣传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表现为重宣传、轻学术的倾向等。如

何解决这些问题?朱文通就此提出两个途径:一个是回归,一个是转型。“回归”就是回到张静如先生一直倡导的研究理念,让李大钊研究首先回归历史学科,也就是使李大钊研究回归历史学视野下的学术研究,把李大钊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用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李大钊,这就需要高度重视研究与李大钊有关的基本史料。所谓“转型”,即研究工作除了使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研究以外,把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新革命史范式等引进来,加以借鉴。老一辈李大钊研究专家的研究经验值得重视,并需要加以发扬光大。张静如先生在这方面有不少论述,应引起年轻一代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刘桂生先生多次呼吁,年轻学者一定要注意李大钊所处的社会环境,并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语境。韩一德先生反复告诫年轻学者,一定要认真读李大钊的原著,研究问题一定要从原著出发。朱文通认为,李大钊研究只有在多视角下,从基础研究做起,借鉴新的研究范式,研究工作才能有根底,才能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野。

朱文通还就李大钊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关系进行分析,阐明李大钊与社会主义思想传入的关系。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李大钊是否受到改良思想和立宪思潮的影响?是否受到来自社会党等方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是否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上述这些思想潮流,在近代中国都曾经影响一时,李大钊或多或少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李大钊的思想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最终才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进而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在近代中国有过三次高潮,1905—1907年间是第一次,1911—1913年间是第二次。李大钊在社会主义思潮的第二次高潮中,开始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先是在天津,后来在东京求学期间,又有进一步接触。留学日本,使李大钊能够从全球化的视角思考国内问题,特别是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和进程,并认真思考

有关问题。其中,包括对俄罗斯政局和第二国际的关注。在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进一步关注俄罗斯政局动向,然后通过对二月革命的深入研究,认定俄罗斯文明是东西文明之外的“第三新文明”。这个成果引导李大钊进而关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成为李大钊后来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重要思想基础。因而在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上,李大钊能够率先一步。朱文通认为,李大钊是最早接触、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社会主义传播的新境界,这是中国人自己探寻的结果。所以,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朱文通还从社团研究的视角,就李大钊与邓培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通过李大钊和同时代人社团活动的比较研究,能够更清晰地透视近代社团向现代政党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着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近代社团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团的角度来看,李大钊和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邓培都与社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亦可见社团活动在他们的一生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李大钊与邓培社团活动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社团活动和工人的社团活动,虽然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有明显差异和差别,但是又能够在社团活动中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和纽带之一,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在社团活动中的相遇并联合起来。

大会主题发言之后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代表就各自论文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大家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同与会专家讨论交流,他们一致感到受益匪浅。

此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来自全国23个省市、103所高校以及省市党校和党史研究室的征文一百九十余篇。征文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涵盖了近年来李大钊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并出现了拓宽和深入以及创新的研究特点。可以说,是近年来李大钊研究的集大成。概括起来,

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作者队伍新老结合,来源广泛。来自普通高校的作者98人,省市党史研究室以及党校的作者51人,社会科学院以及研究机构10人,企事业单位等33人,在读博士研究生18位,硕士研究生32位。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宽。本次研讨会论文主要包括: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与建设、李大钊与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精神与理想信念、李大钊与地方革命活动、李大钊史学思想、李大钊社团思想、李大钊统战与军事思想等多个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三是数量多。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92篇,论文数量比肩年发表量。在中国知网(cnki.net)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李大钊”为主题进行检索,2014年共有148篇,2015年共有142篇,2016年是180篇。四是研究内容的深化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创新。如清华大学王宪明《李大钊与“工人政治”思想探源》一文,就李大钊的“工人政治”思想进行探源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从文本比较的视角加以研究,是近年少有的。北京大学张泽坤的《从文化维度看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从文化视角探讨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其研究视角是过去所没有的,是很重要的创新。中共中央党校高中华教授的《李大钊的甲午观》,选取了学术界过去尚未注意的“甲午观”这个视角,将李大钊的甲午观与李大钊的求学生涯、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等结合起来研究,视角新颖。国防大学于化庭教授的《李大钊对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大贡献》,从中共军事思想角度切入,颇有新意。高龙彬的《李大钊、红色之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研究》,从“红色之路”的视角切入,也有新意。此外,如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沈

志刚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兼谈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李南杨”的构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张守四《北伐战争时期的李大钊与河南》,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向伟博士的《李大钊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高乐乐的《论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兼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起源的贡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裴赞芬研究员的《理性与自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兼论五四进步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与责任担当》,等等,在研究内容或视角均有创新。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与会代表表达了共同的心情:是李大钊的精神、思想和境界的感召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在李大钊英勇就义90周年之际,他们都是怀着无限崇敬与深切缅怀之情来到大钊的家乡参会。与会专家学者达成共识: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不容置疑。李大钊的学说、功业和人格魅力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李大钊的著作和思想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研究。

本次会议是李大钊研究史上一次成功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不仅宣传、推广了《唐山学院学报》“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重点栏目,而且对李大钊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李秀荣)